



清华同衡系列专著

# 文旅融合的理论 探索与规划实践

杨明 张翱 王克敏 等 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在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本书尝试建立一套“理论—方法论—方法”的文化和旅游融合规划体系。本书重点探讨了文化理论发展、旅游理论发展,以及文化和旅游融合的理论关系,总结出具有普适性的方法论。结合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风景旅游研究中心多年来的规划实践,归纳形成化繁为简法、意义升华法、四位一体法、陵墓两极法、主题凝练法五大实操方法,以指导文化和旅游融合型规划设计实践,为业界和学界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010-62782989, [beiqinquan@tup.tsinghua.edu.cn](mailto:beiqinquan@tup.tsinghua.edu.cn)。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旅融合的理论探索与规划实践 / 杨明等编著.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3.11  
(清华同衡系列专著)

ISBN 978-7-302-62365-6

I. ①文… II. ①杨… III. ①旅游文化—旅游业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F592.3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2023)第012937号

责任编辑:张占奎

装帧设计:陈国熙

责任校对:薄军霞

责任印制:曹婉颖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s://www.tup.com.cn>, <https://www.wqxuetang.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83470000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mailto: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mailto: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65mm×240mm 印 张:12.5 字 数:208千字

版 次:2023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23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108.00元

---

产品编号:097960-01

## 作者简介

### 杨明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风景旅游一所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区域/全域旅游规划、文旅融合规划、风景区/度假区规划、旅游小镇和旅游地产规划等。代表规划有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广东省海岛旅游总体规划、延安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九寨沟文旅产业提升规划等。

### 张翊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风景旅游一所项目经理，工程师、中级旅游经济师。主要从事区域/全域旅游规划、文旅融合规划、风景区/度假区规划等。先后参与旅游相关规划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十三五”规划、海南国际旅游岛黎安先行试验区概念规划、九寨沟文旅产业提升规划、陕西乾陵景区旅游规划和详细规划、广西灵渠（世界遗产预备名录）历史文化旅游区战略规划等。

### 王克敏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风景旅游一所项目经理，工程师、中级旅游经济师。主要从事区域/全域旅游规划、文旅融合规划、旅游度假区规划等。代表规划有颐和园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什刹海旅游区发展规划、环嵩山大旅游专项规划、北京市房山区全域旅游规划、河南省光山县乡村振兴先行区规划等。

## 课题组成员

本书源自于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的院级课题《文化和旅游理论与融合规划实践》，课题组成员都参与到了本书的编写中。成员名单如下：

### 课题负责人

袁牧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总规划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杨明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专家顾问

王彬汕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  
风景旅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课题组成员

|     |               |
|-----|---------------|
| 张 翀 | 项目经理，中级旅游经济师  |
| 王克敏 | 项目经理，中级旅游经济师  |
| 杨丽端 | 主创规划师，中级旅游经济师 |
| 张漾方 | 规划师           |
| 袁 婷 | 项目经理          |
| 刘 梅 | 主创规划师         |
| 董宇恒 | 规划师           |
| 周世泽 | 助理规划师         |



# 前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此新时代背景下，国家提出的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是“诗”与“远方”的组合，是满足当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的国家战略。同时，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融合发展，也是建设文化强国、提升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推动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要战略决策，也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手段。2009年中国第一份有关文化和旅游融合（简称“文旅融合”）的文件《文化部、国家旅游局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就提出“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后国家陆续颁布了100多项与文旅融合相关的政策。从政策实践来看，文旅融合经历了探索融合期、快速融合期和深度融合期3个阶段，实现了由探索期向深化期过渡。与国家蓬勃发展、不断出台的文旅融合政策相比，指导文旅融合发展的理论及规划实践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的研究多热衷于寻找国内外相似的文旅融合案例，其结果多是停留在研究的表面。对“文化”“旅游”这两个概念的解读，探究“文化”和“旅游”究竟是什么，这种从根本上理解文旅融合的研究和探讨凤毛麟角。试问，如果连“文化”和“旅游”这种最底层、最基础的概念都无法理解，那如何真正地理解并做好两者的融合呢？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研究背景下，清华同衡风景旅游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历经两年多的资料收集、著作研究、框架搭建等工作过程，并结合清华同衡规划院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黄龙府文化规划、西柏坡景区整体提升规划等一系列文旅融合的规划实践，克服了新冠疫情等诸多困难后，

逐步充实并最终完成本书。

鉴于文化与旅游理论研究的复杂性，本书构建了“理论—方法论—方法”研究体系，希望通过梳理和总结形而上的文化和旅游理论/学说，形成可以指导具体规划的方法论工具，最后理论结合实践通过真实的文旅融合规划案例的“三部曲”方式，从最基本的概念/理论源头出发，到对文旅融合规划的方法指导，让读者对文旅融合有自上而下的、由理论到实践的直观认识。在理论层面，本书详尽梳理文化概念的发展，尤其是在18世纪近代文化概念在德国的兴起、19世纪在英美的发展，以及20世纪以来文化概念的衍生。在此基础上，本书尝试提出了文化概念的4个理解角度，即文化作为背景和语境、文化作为社会化的过程、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形式及文化作为商业化的表现形式。在旅游理论方面，本书系统梳理了休闲、游憩与旅游的理论，以及当代旅游的新形式。在方法论层面，本书通过引入学术界经典的符号化理论与文化经济学的理论，并深度结合文旅融合规划实践，构建了一套兼顾经济与文化可持续发展且具有普适性的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在最后的方法层面，本书归纳了5类文旅融合规划的实操方法：化繁为简法、意义升华法、四位一体法、陵墓两极法、主题凝练法。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包括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清华大学生态规划和绿色建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尹稚老师，清华同衡规划院副院长、总规划师袁牧老师，清华同衡规划院副总规划师、风景旅游研究中心主任王彬汕老师等领导、专家的支持与启发，由于人数众多，在此不一一列举，谨表达由衷的感激之情！

本书的部分内容仍不够成熟，希望得到业界与学界专家学者的理解与宽容。同时真切地希望，随着更加深入的文旅融合学术研究和规划实践的协同开展，我国的文旅融合实践可以对世界文化和旅游领域产生积极的影响和贡献。

# 目录

## 理论篇 | 001

|                 |     |
|-----------------|-----|
| 第1章 文化的概念及理论发展  | 003 |
| 1.1 文化概念        | 005 |
| 1.2 文化理论的发展     | 015 |
| 第2章 旅游理论的发展     | 035 |
| 2.1 休闲、游憩与旅游的概述 | 037 |
| 2.2 休闲理论的中西方发展史 | 045 |
| 2.3 旅游的新形式      | 056 |
| 第3章 文化和旅游理论的融合  | 063 |
| 3.1 文化是游戏的产物    | 065 |
| 3.2 休闲是文化的基础    | 065 |
| 3.3 旅游是文化的一部分   | 067 |
| 3.4 文化理论处于主导地位  | 068 |

## 方法论篇 | 089

|              |     |
|--------------|-----|
| 第4章 文旅融合的方法论 | 071 |
| 4.1 时代化重塑    | 074 |
| 4.2 空间化再造    | 077 |
| 4.3 神圣化聚焦    | 079 |
| 4.4 产业化转化    | 081 |
| 4.5 社会化复制    | 084 |

|                               |     |
|-------------------------------|-----|
| <b>第5章 化繁为简法——复杂文化与旅游融合规划</b> | 087 |
| 5.1 内蒙古准格尔文化园规划               | 089 |
| 5.2 浙江兰溪“三江六岸”景区规划            | 100 |
| <b>第6章 意义升华法——单一文化与旅游融合规划</b> | 111 |
| 6.1 黄龙府文化规划                   | 112 |
| 6.2 广西班夫人纪念公园旅游规划设计           | 122 |
| 6.3 内蒙古牙克石兴安新城南区策划            | 126 |
| <b>第7章 四位一体法——古城老街文旅发展规划</b>  | 133 |
| 7.1 北京什刹海风景区旅游发展规划            | 136 |
| 7.2 浙江临海古城规划                  | 143 |
| <b>第8章 陵墓两极法——陵墓类景区开发规划</b>   | 149 |
| 8.1 西藏藏王墓大景区规划                | 151 |
| 8.2 陕西乾陵大景区规划                 | 158 |
| <b>第9章 主题凝练法——红色文化与旅游融合</b>   | 163 |
| 9.1 甘肃华池南梁革命根据地红色景区规划         | 165 |
| 9.2 西柏坡景区整体提升规划               | 173 |
| <b>参考文献</b>                   | 181 |



# 理论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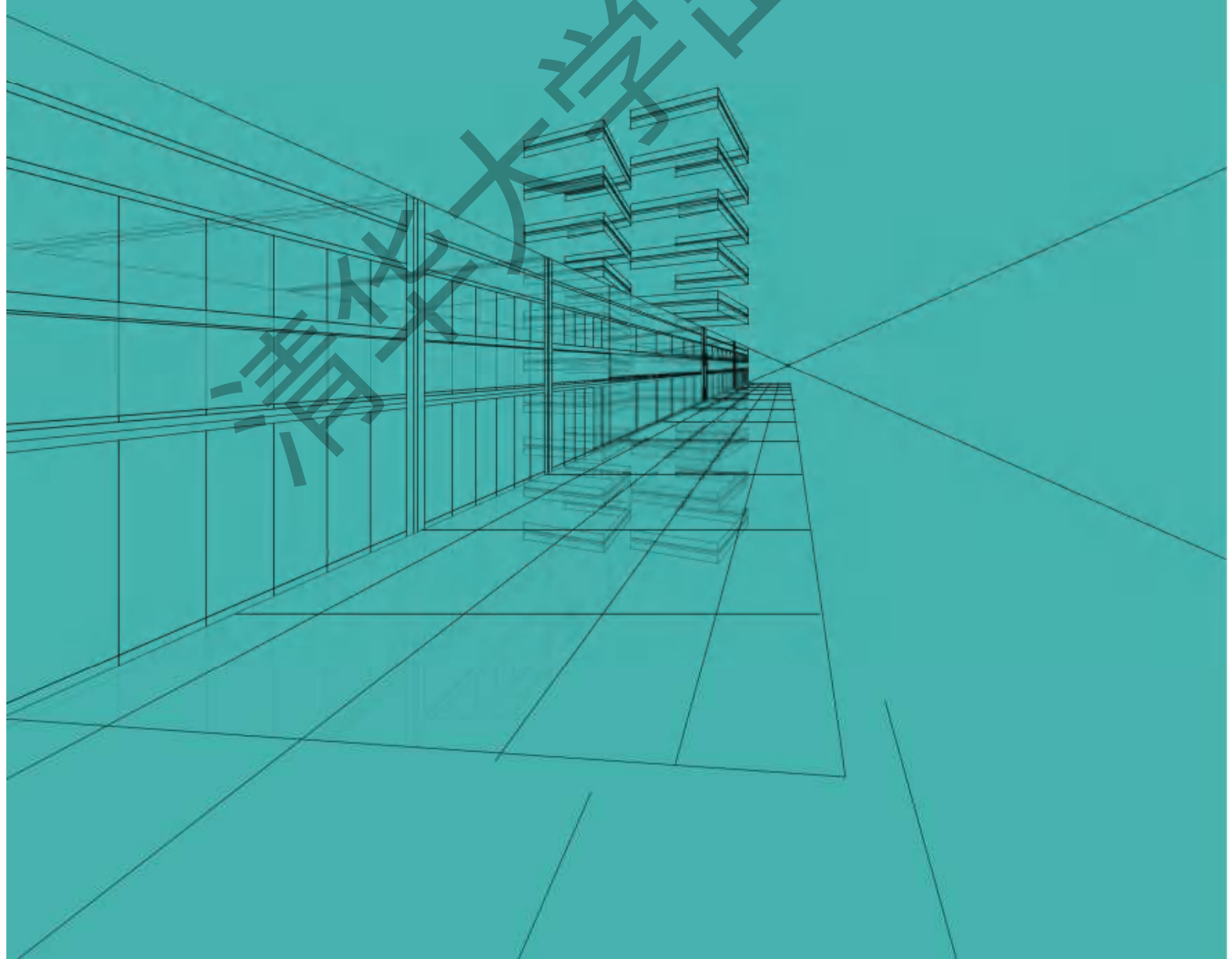
清华大学出版社



# 第1章

## 文化的概念及理论发展

清华大学出版社



文化是什么？关于文化的概念，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众说纷纭的话题。这主要表现在人们对于文化概念的观点不一，且对于文化内容的论述十分丰富。“文化”一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自古便有。近代文化概念源于德国，而后在英美得到发展。目前普遍将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公认为第一个在文化概念上有重大影响的人。泰勒对文化所下的定义被奉为经典，他在*Primitive Culture*一书中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个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自此，泰勒对于文化的定义成为文化定义现象的起源。后人对这个定义褒贬不一，同时也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对于文化概念的探讨本身也成为一种跨学科的有趣的现象，各种学科，诸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语言文学等，都给出了关于文化的不同定义。在对文化概念进行划分时，也存在如“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显形文化”和“隐形文化”，“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亚文化”等众多观点。

本书并不试图对目前多达上百种的文化概念进行逐一的列举，而是尝试通过梳理文化定义的演进进程及文化理论的发展脉络，给出对于文化概念的4种理解角度。

## 1.1 文化概念

### 1.1.1 文化概念的发展变迁

从文化概念的缘起到文化理论流派的发展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古代中国的“文化”一词体现为“人文教化”之意。古代欧洲的“文化”一词的词源有“培育”“培植”的意义，而后逐渐发展为“对品德和能力的培养”。近代文化概念与欧洲启蒙运动有关，并直接形成了法国“文明”与德国“文化”的对立。20世纪以来，专家学者对文化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更广泛的探讨。

#### 1. 古代中国和欧洲文化概念的起源

“文化”在古代中国是“人文教化”的简称，意指通过了解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而对天下民众实施教育感化的一种方法。在中国的古籍中，“文”既指文字、文章、文采，又指礼乐制度、法律条文等；“化”是“教化”“教行”的意思。“文”与“化”两字合用则在汉代正式出现。汉代刘向在《说苑》中说：“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此处“文化”一词与“武功”相对，含教化之意。南齐王融在《曲水诗序》中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其“文化”一词也为文治教化之意。

古代欧洲的“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原义是指农耕及对植物的培育。古罗马的西塞罗最早使用了“灵魂的培植”（cultura animi）的说法。在英语的早期用法中，“文化”一词与动物和农作物的“培育”（cultivation）以及宗教崇拜有关（“膜拜”-cult一词即由此而来）（Smith, 2001）。之后文化的词义逐渐延伸为“心灵的陶冶”及“人类的发展历程”。15世纪以后，对人的品德和能力的培养也称为文化。16世纪之后，“文化”一词开始用于泛指通过学习来提高个人的才智与修养；这个意义是由“改进农耕、畜牧方法”拓展而来的比喻义（Smith, 2001）。出于这一原因，在英语中今天还可以说某个人“有教养”（cultured），或者说他们“没教养”（having no culture）。

## 2. 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对近代文化概念形成的影响

近代文化概念的兴起与欧洲启蒙运动的发展息息相关。在文艺复兴终结了欧洲黑暗的中世纪之后，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的大航海促进了洲际经济和社会交流，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环节；18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革命使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革，标志着世界整体化新高潮的到来；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结束了君主专制统治，形成了新兴“民族国家”。这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巨大变革，对人们的思想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欧洲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之后的一次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法国是启蒙运动的中心，声势最大，战斗性最强，影响最深远。启蒙运动领袖人物法国人伏尔泰写的《路易十四时代》被看作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发端。在《法国学术词典》中，“文化”与随后出现的“艺术文化”“文学文化”“科学文化”等概念共同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Cucheet al, 1996），与进步、发展、教育等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理念相连接。

## 3. 18世纪近代文化概念在德国兴起

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引发人们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使人们开始重视文化问题。一方面，人们开始注意研究离自己最近时代的历史，法国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成为近代文化研究的发端；另一方面，在古代和异族的文献记录中寻找文化材料，以改革和复兴自身的文化（顾晓鸣等，1987）。对于文化问题的重视在18世纪的德国显得尤为突出。

外交学院教授施展认为，在古代欧洲人们一直是将“文明”和“野蛮”对立的，而到了18世纪则出现“文明”（civilization）和“文化”（culture）的对立。对于罗马人来说，本身洗浴是很健康、很干净、很文明的东西，罗马人把这些东西传出去，感觉是传播文明、健康和一系列很好的东西。那些不爱洗浴的人跟罗马人一比，高下立现：一个是文明，一个是野蛮。在古罗马时期，世界分成两种形式——一种是文明的，另一种是不文明的。不文明的地方最终是要被文明征服的，从原则上来说，世界只有一种秩序，就是文明的秩序。18世纪，法国觉得自己是最文明的，凡尔赛宫可以作为文明的标志——它不仅是一个特别精致、漂亮的几何对称图形，超级宏伟的宫殿，更有各种各样的宴会、舞会和非常繁复的宫廷礼仪；并且通过人是否懂得礼仪来作为是否受过良好教育、是否足够文明的一个判断标准。但路易国王的“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开始逐渐异化（这也是人的内心某种基于

虚荣、基于嫉妒等，一种很底层的欲望）。为了满足这种让自己显得很文明的欲望，人们就开始刻意追求文明的外观。例如：吃大餐的时候，你需要做3道手续，我做4道，我比你更文明；他做5道，他比我更文明。文明让法国贵族变得越来越精致化，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文明就变成了堕落。

对于18世纪正在崛起中的德国来说，是无法接受法国对于“文明”的观点和标准的。因为如果德国承认“文明”与否是判断一个国家优秀与否的标准的话，那德国永远是低劣的——欧洲还有哪座宫殿比得上凡尔赛宫，那是不是意味着世界上永远只有一群文明人，那就是法国人，其他人全部是“野蛮”人？这对于当时蒸蒸日上的日耳曼民族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而且法国所谓的文明逐渐过度精致化之后，确实呈现出某种堕落的迹象。所以德国人开始走向另外一种路径，他们认为人们不应该沉迷于所谓文明的外观，那样一定会堕落，而应该回归本心，回归到没有被过度繁复、过度表面文章化的法国文明所污染的古罗马时期的“文化”。于是在18世纪法国封建王朝没落和德意志民族崛起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文明”和“文化”的对立首先在德国人的语境中出现。

在近代，德语中首先出现了“文化”（*kultur*）一词。18世纪，“文化”一词在德国的历史学者中开始广泛使用。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认为“文化”是一种进步的教养（*cultivation*）或是才能的发展。同时也用人类、启蒙等词来代指“文化”。之后，“文化”一词被荷兰、斯堪的纳维亚、斯拉夫、西班牙、意大利、美国等国家或地区接受。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援引德语，确立了英语中“文化”（*culture*）一词专业定义。

外交学院教授施展认为，在18世纪的欧洲，德国强调没有被“文明”污染的本源性的“文化”，意味着一个变化的出现——德国没有法国那样文明的外观，甚至看起来像一个蛮族，但是这种蛮族的身份反倒成了一种自豪的身份；一旦德国能够把“文化”这一种新的说法和评判标准立住的话，就意味着德国和法国之间相比时，便不再处于劣势，因为法国虽然看上去那么文明，但是那只不过证明了法国的堕落；而德国虽然看上去不像法国那么精致、那么文明，甚至看上去很粗粝，但这恰恰是德国不忘初心，真正拥有本真的纯朴的标志。所以德国是有“文化”，而法国只有“文明”；最终“文明”使法国堕落，而有“文化”的德国才代表人类的未来。

如果说法国所强调的“文明”是与野蛮对立的，并且文明跟野蛮的对



峙并不是平等的，而是野蛮最终会被文明所征服、所消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普世主义的标准，所以那个时候的法国是追求普世主义的。而崛起的德国则认为德国有德国的文化，法国有法国的文化，但是法国的“文化”被“文明”堕落掉了，还有若干“蛮族”有各自不同的“文化”。文化和文化之间是没有高低之分的，是可以并立的，所以此时的文化是高度的特殊主义的取向。这种文化的特殊主义的取向后来演化成了近现代的民族主义。近代“文明”和“文化”的对立也就成了普世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对立。

#### 4. 19世纪文化概念在英美发展

无论是启蒙运动中对离自己最近的时代文化史的研究，还是在古代和异族中寻找文化材料以改革和复兴自身的文化，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带来的对封建传统的反思和批判成为人们对于近代文化研究的开端。顾晓鸣等(1987)认为，自此之后，可以明显地看到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文化研究倾向：一种是文化学性质的，是人类对自然和自己的认识史的发展的必然结果——近代自然科学的充分发展为此类方法论工具，而生物进化论的研究的下一步当然是人类自身的问题，和达尔文同时代的、持进化论观点的泰勒就提出了“文化进化论”；另一种是以文化问题为旗帜，实际上为了解决现实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问題，文化讨论是政治和思想变革的一种舆论准备或者表现为一种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建设的努力，文化研究成为思想建设和完善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近代欧洲殖民扩张活动，不断地把完全不同于当代各文明国家文化和古典文化的原始民族和部落的文化材料送到人们的面前。由于殖民统治的实际需要、宗主国学者收集文化资料的可能性，使学者可以按照一定科学计划对一种文化实施从生活习俗到政治制度的全面调查，并如实发表成果；充足的经费和官方的支持，也大大激发了学者的科学兴趣，加上自19世纪末资本主义社会日趋保守，大量学者把注意力从对本社会文化研究转向相对来说无利害关系的殖民地原始文化的研究，大量人种学材料累积起来，这促使了文化人类学实地文化研究的成熟，产生了科学形态的文化理论（顾晓鸣等，1987）。

19世纪是大师先贤们开创近代文化概念和文化研究的时代。给“文化”一词下明确定义的，首推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他于1871年出版了《原始文化》一书，书中指出：“据人种志学的观点来看，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

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以摩尔根为代表的人类学家认为，文化历史阶段具有统一性，包括七大发展阶段：低级蒙昧社会—中级蒙昧社会—高级蒙昧社会—低级野蛮社会—中级野蛮社会—高级野蛮社会—文明社会。马克思提出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并阐释了社会与历史发展的过程。他认为，文化作为一种附属性的上层建筑，是一种支配性意识形态。

在泰勒、摩尔根、马克思等先驱之后，整个19世纪文化研究在英美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英国文化社会学家阿兰·斯威伍德认为，在18世纪末，文化大多与文明的概念等同起来，被作为一种整体论的概念，如世界观或者“心智”；但是到了19世纪，这个词指从初期的工业主义向资本主义和现代化转变。文化的概念被逐渐提升到了智性高度，被等同于思维习惯和人性价值。斯威伍德认为，19世纪的文化是依据艺术和“高级”文化，而不是“低级”或“普通”文化而得到的理想的定义。在英格兰，文化以人性完美和创造一种普世价值为中心，建立起一种美学和文学的话语——文化用来指“心灵的某种状态或习惯”；而后指代“一个社会整体中知识发展的一般状态”；之后表示“各类艺术的总体”。到19世纪末，文化开始意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韦森，2003）。

## 5. 20世纪以来文化概念的衍生和探讨

20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稳定期，文化研究深入到各个领域和学科；而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批判和各种反文化思潮的理论分析，成为文化理论研究的又一社会动因。同时，人对自身和社会的科学认识从最初简单采用自然科学的模型到走向进一步科学化的近代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需要，也成为文化研究本身发展的动因。于是，在19世纪泰勒、摩尔根、马克思等先贤开创了文化研究的先河之后，20世纪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概念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热潮。

20世纪文化研究的动因主要包括3个方面：第一，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稳定期后，日常生活和建设促使文化研究深入到各个更细微的领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多样化和新旧急剧更迭的局面。一方面，各种亚文化的界限日益明显，文化价值和文化象征意义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纷繁景象，个人创造文化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印刷机械、广播电视、电影、音乐、

广告、报刊书籍的飞速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文化自然积累的状态，人工大量制造“文化”、复制“文化”、传播“文化”……人自觉的文化创造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狭义文化艺术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个人—文化—社会”三者的关系成为文化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为了解决其间的具体关系，一系列分析性的概念和理论产生了，这就是围绕象征符号、意义、价值、需要、文化情境、制度等而建立的种种文化理论。第二，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批判，这是现代文化理论勃发的又一社会动因。许多学者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看到了资本主义不断出现的危机，看到了现代文明消极的方面，但他们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因此，形形色色的文化归因论出现了（顾晓鸣等，1987）。第三，与社会动因相对应的是学科发展本身的动因。人对自身和社会的科学认识，是在自然科学方法的激励之下，逐步从哲学的玄思走向近代社会科学的。因此，近代早期的社会科学对于人类和社会的研究，往往简单地采用自然科学有关学科（生物学、机械学、自然心理学等）的模型，而忽视了人类社会自身的“人的特点”——人有“自由意志”，不同于物和非人动物；个人之间的差异极大；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一次性过程；人具有人生经验和历史经验的积累等。随着近代社会科学的日益成熟，这种“唯科学论”的自然主义研究的理论方法论的弱点日益暴露出来。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文化”问题的提出，是人们对于人类社会区别于自然的独特性质有深刻认识的体现，是社会科学进一步科学化重要环节；今天几乎所有的学科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文化研究——经济学日益注意到制度和对于理想形式形态的经济规律的制约，语言学日益向社会语言和文化语言研究靠拢，连科学史家也日益注意到了自然科学的范式受到所在文化的深刻制约（顾晓鸣等，1987）。这种状态是现代文化研究的重要科学动因，当然它也同有关学科和理论课题的现实社会需要是互为因果的。

20世纪关于文化概念的研究和讨论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发展了泰勒对于文化的定义，他于20世纪30年代著有《文化论》一书，认为：“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包容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他还进一步把文化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即所谓“已改造的环境和已变更的人类有机体”两种主要成分。用结构功能的观点来研究文化是英国人类学的一个传统。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阶级在与他

人的接触交往中习得的思想、感觉和活动的方式；文化是人们在相互交往中获得知识、技能、体验、观念、信仰和情操的过程。他强调，文化只有在社会结构发挥功能时才能显现出来，如果离开社会结构体系就观察不到文化。例如，父与子、买者与卖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只有在他们交往时才能显示出一定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认为：“文明社会是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领域，文化既是制度，也是实践，紧密联系着历史与政治，与权力关系相交织。”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从行为规范和模式的角度给文化下定义，他提出“文化是一组行为模式，在一定时期流行于一群人之中……并易于与其他人群之行为模式相区别，且显示出清楚的不连续性”。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逐渐碰撞演化成为一种商业文化”。英国人类学家弗思认为，文化就是社会；社会是什么，文化就是什么。他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组织要素》一书中指出，如果认为社会是由一群具有特定生活方式的人组成的，那么文化就是生活方式。1952年，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科拉克洪发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对西方在1871—1951年关于文化的160多种定义做了清理与评析，整理出了6类主要观点，包括描述性定义、历史性定义、规范性定义、心理学定义、结构性定义和发生学定义，并以此为基础给文化下了一个综合性定义，即“文化由外显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借助象征符号的运用得以获得和传播；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他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的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带来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这一综合定义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认可，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称“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这“共业”包含众多领域，如认识的（语言、哲学、科学、教育）、规范的（道德、法律、信仰）、艺术的（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器用的（生产工具、日用器皿以及制造它们的技术）、社会的（制度、组织、风俗习惯）等。

### 1.1.2 文化概念的理解角度

从古代中国和欧洲“文化”一词的起源，到18世纪近代“文化”概念在德国的诞生，直至今天，对于“文化”的定义依然众说纷纭，不同的研究

者对于文化概念的理解各不相同。但纵览所有的这些文化概念，总体上可以归纳为四种理解角度：第一，文化作为背景和语境，即“文化”是人类独有的，是与“自然”相对应的范畴；第二，文化被纳入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社会变迁的研究之中，体现了社会化的过程；第三，文化被作为特殊阶级和政治利益的反映来分析，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第四，文化作为商业化的表现形式，历史上曾有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分，而后随着商业化的发展争议逐渐消失，最终倾向于对大众文化的探讨。

### 1. 文化作为背景和语境

文化作为与“自然环境”相对应的人类的“文化环境”，有时也特指文学和美学分析之中的文化“符号”。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富永健一认为：“广义的文化是作与自然相对应的范畴。在这种情况下，技术、经济、政治、法律、宗教等等都可以认为是属于文化的领域。狭义的文化是产生于人类行动，但又独立于这些客观存在的符号系统。”

广义的文化是人与自然相区分的标志，是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包括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泰勒认为“文化是与过社会生活的人类所特有的状态相关联的东西”。马林诺夫斯基注重社会文化功能方面的研究，他将文化作为整体来分析。他认为：“文化在其最初时以及伴随其在整个进化过程中所起的根本作用，首先在于满足人类最基本的需要；这样，文化起初的含义就成了在自然界未给人类以装备的各种环境条件下的人类生存自由。文化的出现将动物的人变为创造的人、组织的人、思想的人、说话的人以及计划的人。”“文化不过是人类的有组织的行为。每一种文化成就都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了人类的需求。”他提出语境理论，创造了“意义就是语境的功能”原则。

狭义的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倾向是文化被融入文学和美学分析之中。通过对文化构成要素的解构和对文化系统的剖析，阐释文化创造和发展的过程以及独特的功能意义，包括图腾和神话隐喻、文学文本、符号学模型、话语和语言结构等。在马修·阿诺德的著作中，文化被定义为创造性的文学文本作品，体现高度的道德价值。文学批评家利维斯和艾略特大大推动了文化的社会语境化，并开启了英国文学研究中关于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与小众文化的争论。在结构主义研究中，认为文化与语言相似，通过分析文化的表征系统，研究深层解释。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神话即语言”，通过图腾和神话

解释原始思维过程。罗兰·巴特采用文化的符号学模型进行研究，包括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组合与系统、指称与内涵。福柯通过话语理论研究文化，他认为“话语能用来描述、定义和分类，并对人群、事物，甚至是知识和抽象的思想体系进行思考”。

## 2. 文化作为社会化的过程

文化理论研究是人类对自然和自身认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文化研究自然而然地被纳入对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社会变迁的研究之中。文化研究的社会化特征与学者们所在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出现了文化进化论、文化决定论、结构主义文化理论等一系列探讨文化作为社会化过程的文化理论。

在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得较早、殖民地开拓早具规模的英国、法国，文化研究与对内的资本主义建设和对外的殖民统治的实际目的紧紧相连。从泰勒的进化论到博厄斯的个体与社会的互动，都反映了文化的社会化倾向。泰勒认为，人类社会文化遵循着从低级到高级、从野性到文明的“几乎一致的渠道”，文化的科学实际上是改革者的科学。因此，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是社会进化论和实证主义，注重实地研究，相信文化传统的普遍规律。在继文化进化论的观点之后，文化的理论研究又发展出了文化相对主义，也叫文化决定论，反对文化种族主义的观点，成为文化研究中一个比较进步的分支。博厄斯主张“文化本质上是特殊历史情境偶然积聚形成的特质和价值，需要放在独有的社会层面上进行分析，不同社会价值体现差异化的文化行为”。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怀特强调工艺因素对文化的决定性作用，文化研究是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一部分。

反映社会和科学特点的早期德国文化研究，具有不同于英法的倾向。难以解决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使人们离开简单的进化模式，求助于各种文化哲学的思考。文化实证研究和文化哲学的综合，既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西方社会趋同的体现，又是文化研究各种方法论互补的结果。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稳定期，个人—文化—社会的关系成为文化理论的核心问题，从而形成了围绕象征符号、价值、需要、文化情境、制度等建立的文化理论。当代社会学家帕森斯建立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文化系统，用一系列社会学概念分析文化、制度、规范和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他提出：“文化作为象征性的意义系统，既塑造人的行为，也塑造最终生成的产



品。文化被嵌入和简化到社会系统的层面上。共同价值系统构成了社会整合的重要前提。”（Parsons, 1951）

### 3. 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形式

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中，文化研究成为意识形态思想建设和完善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讨论和研究中可以看到一种明显的倾向，即以文化问题为旗帜，实际上解决现实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问題。文化讨论是政治和思想变革中的舆论准备，或者表现为一种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建设的努力。文化常常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并被作为特殊阶级和政治利益的反映来分析。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提出“文化是一种附属性的上层建筑，文化是一种支配性意识形态”。葛兰西提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霸权式信仰成为居于支配地位的文化主题。他勾勒出文化在社会变迁与社会整合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坚持文化在现代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中的相对自主性。与之相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直接把文化生产与阶级利益等同起来，文化形式被当成特殊的社会群体或阶级的心理状态或意识形态来表述。阿尔都塞提出，“上层建筑有助于产生资本主义生存所需的条件，它的主要功能是让资本主义得以再生产”，并提出“压制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两种控制方式。

### 4. 文化作为商业化的表现形式

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在不断发展，逐渐演化为商业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19世纪的法国产生了“高雅文化”（或称为精英文化，high culture）和“低俗文化”（或称为大众文化，low culture）之分。社会赋予“高雅文化”比“低俗文化”更高的价值，并将有价值的事物与无足轻重的事物区分开来（Bourdieu, 1979）。因此，精英群体就可以维护自己的技术和知识的价值，从而确保群体自身的地位。

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末，文化产业相关理论发展经历了诞生、发展和基本成型3个时期，并造就了与之相对应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学派和美国文化产业学派（江奔东，2008）。文化艺术品工业化的批量生产，显示着文化产业的端倪。文化产业理论是在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

否定和批判中产生的。法兰克福学派大多从维护高雅文化的立场出发，对低俗文化持否定态度。他们指出：“文化工业操纵和控制着艺术，通过消费主义和广告业联合，将文化现象与标准化的商品生产一道，取代了批判的和创造性的文化表述。”英国文化学派则对低俗文化不再持排斥态度，而是转向研究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到了美国文化产业学派时期，随着工业化和商业化的高度发展，工业化的文化产品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此时关于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争论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他们将研究重心转向文化产业的经营、运行和管理。他们认为，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可以共存发展，是因为他们拥有不同的受众群体。

随着资本主义商业化的发展，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消除了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鸿沟，使得前工业时代二分法受到严重动摇。有较高道德价值的前工业文化与围绕“原子化”的社会结构建立的工业的、资本主义的低俗文化之间形成对立。在当今时代，随着大众媒体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商业化发展，低俗文化已被民众广泛接受，甚至成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低俗文化具有批量生产的属性，最终目的是促进大众消费。后现代性表达了以文化、文化消费、媒体与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后工业经济形态。詹姆森提出：“我们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后期阶段，它的特征是符号与象征的无尽循环，以及全球范围的信息流动。形象的享乐主义消费是这个资本主义阶段的核心”。大卫·哈维的观点是，“后福特时代，受资本驱动的趋势蔓延到文化生活中，如媒体、风潮、流行、影像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斯科特·拉什强调，后现代的主要内容是“去分化”，文化、经济与政治的直接界限正在瓦解，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越来越难以区分；影像与奇观取代叙事和历史作为文化生活的核心地位。

## 1.2 文化理论的发展

文化理论的研究经历了18—19世纪的近代文化研究发端，到19—20世纪文化的理论化，以及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文化理论分化。18—19世纪的文化理论主要包括以泰勒为代表的文化进化论、以博厄斯为代表的文化决定论。19—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实现了文化的理论化，在经济文化生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之后，文化理论分化共存，产生了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等文化思潮，具体发展如图1.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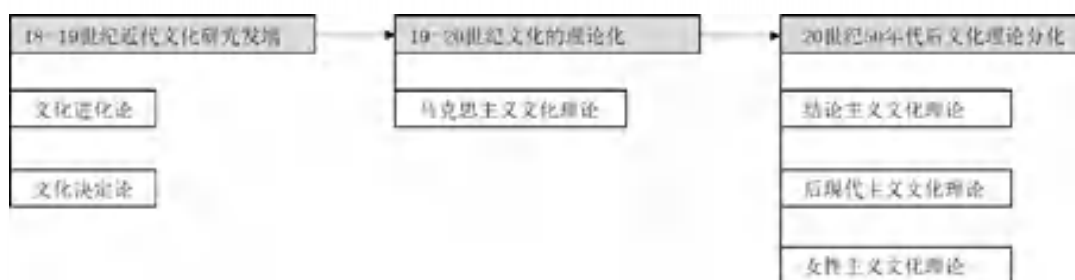


图1.1 文化理论的发展框架

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被认为是近代文化研究的发端。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引起人们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使人们开始重视整个文化问题。在19世纪，随着欧洲的殖民主义在全球扩张，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民族和部落的文化材料呈现在人们面前。同时，实证主义思想从自然科学领域延展到社会科学领域，推动着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发展。作为欧洲启蒙运动精神的传承人，当时的人类学家在一致承认人类社会的统一性的同时，试图提供一种客观方法来解决人类社会多样性带来的社会问题，并主要形成了两大理论派系：一是以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为代表的“文化进化论”派系，二是以博厄斯为代表的“文化决定论”派系。“文化进化论”极力提倡人类文化的统一性，用文化演进的普遍规律来解释文化现象，把文化多元性带来的社会影响降到最低。“文化决定论”则重视多元化和与多样性，提出文化只能以多元的形式存在，文化形式纷繁复杂、多种多样，不能使用宽泛的理论来对不断演进与发展的文化进行简单概括。以博厄斯及其学生为代表的美国人类学家创建了以特殊的文化情境来理解文化的理论框架。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学对文化社会学进行了广泛地涉猎，从哲学和文化资料两方面进行分析，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试图让文化在社会生活调节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维护中有一个积极主动的角色。

结构主义最初是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流行的哲学思潮，继而在欧美等西方各国内传播开来。其影响不仅波及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而且通过巴特等人的叙事学和符号学研究又扩展到文学批评、历史学乃至哲学等领域，奠定了后结构主义的发展基础。结构主义的特点是探寻文化的深层结构和模式，尤其是用语言中的结构和模式来解释文化现象，因此结构主义的观点是将文化现象理解为系统中的要素。

后现代主义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通过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让·鲍德里亚等学者实现理论化。后现代主义被视为宏大叙事与普遍真理的掘墓者，开启了一个尊重差异、文化多元的新时代。后现代主义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莫过于人们开始认识到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完成了人类社会价值标准的转换过程，致使价值多元主义时代的来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女性主义独立成为一种波及所有人文学科门类的声势浩大的社会思潮。根据英国文化理论家约翰·斯道雷对女性主义的观点，女性主义拥有不同流派，主要包括激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双重系统理论等。

### 1.2.1 文化进化论

#### 1. 理论内涵

文化进化论源自于达尔文的自然科学进化论，把人类文化的发展看作统一的，也称为“文化统一论”。文化进化论认为人类文化和社会进化的一般性规律是由低级向高级的，由原始的、野蛮的阶段向现代的、文明阶段的有序进化。也就是说，文化进化论的核心思想是假定文化实践只能在普遍的进化阶段的框架中才能得到解释。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文化进化论”是文化理论研究中的核心思潮。

#### 2. 历史源流

由于人对“文化”的认识是在区别生物遗传性和人工习得性过程中逐渐发展的，因此，近代文化研究的勃发是生物进化论研究的成果和伴生物。达尔文关于人类进化和“性择”等研究，开启了文化研究之先声；和达尔文同时代并互有启发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是近代文化研究的前驱者。斯宾塞在把社会类比于生物机体的同时，特别指出了社会不同于生物机体的“超机体”的特征，开始应用于人种志的材料，提出文化问题的研究（顾晓鸣等，1987）。与达尔文发表论人类进化著作《物种起源》同时代的泰勒，在其发表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同样持进化论观点，他提出的文化定义成了经典定义之一。

文化进化论经历了古典进化论和新文化进化论两个时期。19世纪末，以

泰勒和摩尔根为代表的人类学家，提出了文化进化论思想，被称为古典进化论。它是一种“单线进化论”，实际上是一种机械进化论，后来古典进化论在反进化论思潮影响下逐渐衰落。到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怀特的努力下，新文化进化论开始崭露头角，并于20世纪40年代开始成为文化人类学的主流思潮。

### 1) 理论奠基——古典进化论

19世纪末，以泰勒和摩尔根为代表的人类学家提出了文化进化论思想，被称为古典进化论。古典进化论的主要观点是人类社会文化处在不断进化的进程中，并且经历着从低级到高级的普遍规律。

英国人类学的创始人泰勒的重要贡献在于其对于文化的定义和文化进化论的观点。他以均变论和遗留物为原则，进行人类文化的历史重构。均变论的核心观点是文化的过程对于所有民族都是相似的，不论他们在何时何地生活，因为人类的思想都是相似的。因此，“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遵循‘几乎一致的渠道’，表现为进步的特征，并且在文化的进化中得以展现。”遗留物是指“仪式、习俗、观点等，它们被习惯于从所属的社会阶段带入到新的社会阶段，于是成为较古老文化的证据和实例（Tylor, 1958）”。文化进化论是泰勒《人类学》一书中的核心观点，他强调文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

“历史表明，艺术、科学以及政治制度最初都是从残暴粗鲁的国家中发展起来的，并且在历史的进程中变得愈加进步和系统，越来越易于控制和组织，以达到它们的初衷。”泰勒的文化进化论体现着一种不均衡的决定论：一方面，人类的历史是由进步而不是退化构成的，是经过了由简单到复杂的转化，走过了从野性到文明的轨迹；另一方面，人类学对于人类进步做出了贡献，“文化的科学实质是改革者的科学”。

摩尔根在文化进化论的框架下，通过田野观察和广泛的跨文化资料研究，编辑出版了《古代社会》这一杰出的人类学著作。他研究了全球范围的亲属称谓制度，总结出类分式与说明式之间的差异，标志着未开化与文明之间的区别；并指出是私有财产及权利的产生使得称谓制度得以进化。这种理解不同社会之间历史联系的方法，逐渐转变为理解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主题。《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关于人类早期情形的研究表明，人类是从低等级开始其生涯的，并通过缓慢的经验性积累，逐步从愚昧迈向文明。”“人类的不同部分，都代表了同一链条上的不同位置（Morgan, 1877）。”摩尔根认为，“连续发展的生存技术才是人类在地球上拥有至上

地位的基础”，这暗示着“人类进步史上的伟大时代，都被认为或多或少与生存资料的增长直接相关”。这种关于文化进化的物质基础的理论，被后来的文化进化论者视为摩尔根的主要遗产。摩尔根的贡献是重要且持久的，他试图将人类学的资料根据文化进化的清晰框架来进行处理，而不只是将文化差别当作民族志的猎奇。

## 2) 理论发展——新进化论

20世纪30年代，文化进化论学者们坚持摩尔根等人的进化论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科学的法则，使得文化进化论思想更为精致化和系统化。同时，把文化变迁和不同的物质存在领域相连，提出了“技术—经济”是文化或社会进化的决定性因素，被称为“新进化学派”。

对进化原因的解释是唯物主义的，强调的不是历史重构，而是提供因果解释的重要性。怀特将文化划分为技术的、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3个范畴，提出了“普遍进化论”。他认为，文化是人类适应物理和社会环境的手段，“文化是一个需要持续获得和转换能量的热力学系统”。文化的动力只能来源于能量，文化能否进步取决于对能量的发展、利用和控制。斯图尔德的核心观点是“多线进化论”，提出文化是随着对环境的适应而进化的，相似的文化模式反映了对相似环境状况的相似适应（Steward, 1958）。他提出了多线的而非单线的进化。萨赫林斯综合了两者的观点，认为文化进化包括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前者是一个历史形态的连贯，后者是既定发展顺序中各种形态表现阶段的序列。马文·哈里斯用人类生活的3套体系（基础结构、结构和超级结构）来解释文化模式。他认为，基础结构与社会对生产和再生产的控制相关，涵盖技术、人口、谋生手段和环境等方面。这种解释根植于物质因素而非意识形态构建物。基础结构的革新将倾向于改变结构体系，对于因果关系的影响更大（Harris, 1992）。

## 3. 理论影响

文化进化论作为自19世纪后半期兴起的一个理论流派，以其浓厚的自我意识充当了时代思想的先锋，泰勒和摩尔根关于文化进化理论影响深远。在经历20世纪初期反进化论的衰落之后，20世纪的新进化论者们通过对进化原因的关注，使得进化论重新浮现。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这些观点在美国人类学界处于中心地位。



## 1.2.2 文化决定论

### 1. 理论内涵

与文化进化论相对，以博厄斯为代表的人类学家对文化进化论视角进行了质疑，并提出“文化只能用特殊文化模式来加以解释”，即只有在其特殊的文化情境中才能理解一个特定社会的实践，被称为“文化决定论”或“文化相对论”。在博厄斯影响下，一大批美国人类学家，如克罗伯、本尼迪克特、萨丕尔等对文化因果条件、个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 2. 历史源流

#### 1) 理论奠基——特殊的文化语境

文化相对论诞生于近代的欧洲殖民扩张活动。博厄斯认为，文化实践只有放在特殊的文化语境中才是可解释的，这一观点确定了20世纪美国人类学的发展方向。他曾举例说明，“国家博物馆里的人类学藏品不应该按照技术的‘阶段’来展示，而应按照其所属部落来安排布置，以体现各个群体独特的风格”。博厄斯推翻了文化进化论模式，为研究特定文化提供了理论支持。他坚持，文化是由特殊历史过程造就的统一体，而非普遍进化阶段的反映。同时，博厄斯暗示了个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关系，即文化要素与文化整体之间的关系，但并未真正解释文化整合的过程。

#### 2) 理论发展——个体与社会互动

博厄斯的基本方法传给了一大批美国职业人类学家，他们包括克罗伯、本尼迪克特、萨丕尔等。如果文化本质上是被发明、传播和人口迁徙的特殊历史情境所偶然积聚在一起的不同特质和价值，那么文化又怎么能融为一体呢？像博厄斯写到的那样，“文化发生的因果条件在于个体与社会的互动”。那么这种互动的本质是什么？是什么赋予了文化特殊性？博厄斯的学生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艰苦探索。他们的答案可以用3个概念加以框定：文化在因果上的优先性、微观世界或缩影概念、文化知识正在迅速消失的认知。

克罗伯认为文化是与社会、个体或者有机体相区别的一种现象，它是一种普遍的、超生物的统一体。文化是由习得并共享的习俗与信仰元素构成的。文化存在于其自身独有的分析层次上，不能够还原为其他层面的现象，而只能从其自身的特征来加以解释。他创建了“文化地区”和“文化模式”

概念，从而研究一个特定地区内各种社会群体的基本特征的空间传播与适应方式。他强调：“一方面，人们在理解文化时，主要借助于文化因素；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文化，如果脱离了非文化因素或环境，它将不能被人们所理解。”文化在某些方面的变化，主要是风格上的变化，也许是由文化内部个体所不知道的超有机体的律动所支配的。

本尼迪克特的理论深刻影响了文化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与个性领域。她把文化设想成某种由知识、宗教与审美因素组成的完全概念。她在1934年所著的《文化模式》一书描绘了3种不同的文化，并做了比较分析，集中体现了她对普世文化弧线的理论假设。她认为，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基于存在的基本价值之上的完形，而这些价值因文化而异。文化具有各自独特的本质，因为个体是作为特殊文化的成员而习得核心价值的。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基于价值。

萨丕尔是人类语言学的创始人，他重点研究文化与语言、个人的感知能力与认知能力之间的关系，以此来解释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表现出的不同文化行为。他坚决反对“文化可以独立于人类本身在不同文化之间传播”的观点，认为“文化是一个被参与到公共话语当中的个体不断修改的文档”。个体远非文化的消极产物，他们通过行为和言语建构了文化。甚至那些文化最基本的观念也并不是对基本的、恒久的价值的集体表达，而是争论和异议的对象。语言和象征符号的运用使人类可以积极地创造新的文化形式。萨丕尔引发了关于意义的文化建构的讨论。

### 3. 理论影响

19世纪90年代末期，博厄斯对进化论模式展开批评，削弱了文化进化论的整体基础。博厄斯认为进化论的单线排序不过是个简单的假设，但是这种历史关系无法证实，也没有办法证明这样一种关系的存在。他推翻了进化论模式，为研究特定文化提供了理论支持，并暗示了个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关系，即文化要素与文化整体之间的关系。博厄斯的观点在美国人类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初期掀起了一股反进化论的潮流，相关研究开始从相似性转为关注差异性，直到20世纪40年代进化论方法被重塑。博厄斯的学生们在他发现的关键环节，即个体与社会间的关系方面持续研究。正是他的学生们在对于文化本质的不断探索和讨论中，使得文化决定论形成深远的影响。

### 1.2.3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 1. 理论内涵

初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以“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为基础，认为文化作为一种附属性的上层建筑，属于支配性意识形态，文化力量被边缘化了。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试图将文化的解释纳入马克思理论框架体系中，并具有很强的人文主义特征，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

#### 2. 历史源流

##### 1) 理论奠基——马克思主义

初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认为，文化作为一种附属性的上层建筑，是一种支配性意识形态。马克思提出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并阐释社会与历史发展的过程。他认为，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都是围绕特定“生产方式”被建构出来的。“经济基础”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包括制度和与之相生的“社会意识的确切形态”（如政治、宗教、哲学、文化等）。文化没有自主性，只是作为其他社会力量的反映而存在，实际上被经济和政治力量边缘化了。但是尽管文化的文本和实践从来不是历史的“原动力”，但却在历史变迁和社会稳定中扮演了行动者的角色。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统治阶级总是想方设法地把自身利益呈现为所有社会成员的集体利益，从而导致了意识形态的斗争和冲突。他们认为，文化等级关系与社会群体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有着直接的联系。

##### 2) 理论发展——新马克思主义

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文化视为经济基础的衍生物”观点持反对态度，试图让文化在社会生活调节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维护中有一个积极自主的角色。在研究中更为关注人的经验、意识、自由、集体联系等，这种取向与注重结构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对比，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或“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有阿尔都塞、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霍克海默和本雅明等。

阿尔都塞试图对马克思“经济决定论”与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性思想进行调和。他更为注重对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提出“压制性国家机器”和